

## 英國的官方國家認同—— 早期「帝國主義認同」之發軔與建構\*

張洋培\*\*

大同大學通識中心主任

### 摘 要

英國是近代「帝國主義國家認同」的重要發展源地及中心之一。英國起初使用的建構「帝國主義國家認同」的工具，主要有三：其一為軍事武力、其二為共同宗教、其三為共同語言。都鐸王朝與斯圖亞特王朝，係英國建構國家認同感的第一期重要階段。本研究的方向，在於討論第一期英國官方帝國主義認同感的建構，並期望以這段發展歷史為鑑，權充台灣建構或維護國家認同的他山之石。

**關鍵字：**官方國家認同感、帝國形象、大英帝國、民族意識、共同敵意、共同語言

---

\* 本文發表於2006年6月由文建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所主辦之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本篇論文僅將討論(一)前西發里亞期，其他四期則留待日後發表。

\*\*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 壹、前言

在 1945 年以前，擴張型的帝國大多是憑藉著武力為後盾，施行現實政治（*realpolitik*），欺凌四鄰，或直接併吞，或納為屬地，或列入勢力範圍。大帝國比較容易藉著擴張之際建立起官方國家認同感（*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他們統一境內語言，建立帝國形象（*imperial icon*），維護社會價值觀，加強文化、政治及經濟等典章制度，進而再以此一認同感團結內部，吸納邊區弱勢國家。這個認同感，維繫了區內居民的共同記憶、共同語言、集體意識、相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共同的榮譽感、共同的政治觀、共同的宗教信仰，乃至於共同的對外形象。弱小國家或民族的生存空間及地位，長期受到這些大帝國的擠壓，因此逐漸喪失原有的民族認同感及語言勢力，甚至慘遭同化消滅。人類的戰爭史，每每是這些大帝國擴張領土的發展史，或是大帝國之間競逐領土的鬥爭史。侵略性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力量，在東西歷史之間，時起時落。

近代國家的早期認同感本是自然形成的，至於官方國家主義及帝國主義之維護、建構、更替及解構（Anderson, 1991: 83-112），則是十七世紀「民族國家」（*nation-state*）開始發展之後的歷史新現象。1648 年的『西發里亞和平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是歐洲基督教民主國家追求獨立與建立「民族國家」的源頭。今日許多歐洲國家之建立國家認同，並得到國內外承認，大多由此開端。這個條約肇始了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的分裂，結束了當時歐洲以教皇國（*Papal State*）及神聖羅馬帝國間接掌控全歐洲的統一格局，並為後世開創了建構國家民族認同感的新浪潮。

英國是近代「帝國主義國家認同」的重要發展源地及中心之一。英國起初使用的建構工具，主要有三：其一為軍事武力、其二為共同宗教、其三為共同語言。然後透過工商業發展、教育及宣傳，維護國家形象，走入軍事、商業與文化並進的新帝國主義（*neo-imperialism*）。1921 年時，大

英帝國 (British Empire) 及其海內外殖民地 (Said, 1993: 163; 239), 大約擁有四億至五億的人口, 約為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土地範圍約有三億七千平方公里, 也是全球的四分之一。後來, 大部分的殖民地紛紛獨立, 加入大英國協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這是帝國最興盛的巔峰時期, 其影響力所至, 廣及經濟、法律及政府組織系統, 英語成了國際語言, 帝國的風尚、衣服、運動皆成為世人模仿的對象, 帝國主義的認同感穩固而堅定, 「日不落國」(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 的稱號, 普為世人認同<sup>1</sup>。

1970 年以來, 薩依德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 (Orientalism)<sup>2</sup> 所反對的對象, 便是英國官方「帝國主義的國家認同」(Said, 1993: 15-20, 230-31; Moore-Gilbert, 1997: 39); 這是壓垮英國帝國主義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透過反對「盎格魯中心主義<sup>3</sup>」, 英國殖民地重建自己的國家認同, 走向實質的獨立, 實現今日多元文化的國際政治關係, 從而解構英國帝國主義的認同觀 (Moore-Gilbert, 1997: 16, 27)。

在這條長河裡, 英國式帝國主義認同的發展歷史, 可依時序的先後, 大略分為以下五期:

1. 前西發里亞時期, 時間大約是 1066 年至 1648 年之間。這是建構國家認同的奠基時期。
2. 內戰建國時期, 時間大約始於 1648 英國內戰之際, 經帝國國會之形成, 以及漢諾威王朝 (Hanover dynasty) 之確立王權與內閣制, 而終於 1803 年, 英國承認美國之獨立。
3. 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時期 (1803 至 1914 年)。在這一百年之間, 英國挾著工業革命之成功, 及強大的海權, 在海外建立「日不落國」形象。這是形成帝國主義認同的巔峰期。

---

<sup>1</sup> 見 on-lined resour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Empire](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ish_Empire); 以及 Taylor (1989: 106-10, 113-14)。

<sup>2</sup> Said 的名著 *Orientalism* 中對東方主義加以定義 (1979: 1-6、202-3)。

<sup>3</sup> 意指英國中心主義。

4. 廿世紀解構時期（1914 至 1990 年）。在這一百年內，英國式帝國主義面臨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遭逢美國及蘇聯兩大國際強權之冷戰風暴，歷盡英裔白人殖民自 1920 年左右起之獨立風潮，乃至 1954 年起英屬有色人種殖民地之獨立考驗。英國終於在 1960 年於南非議會宣布「改變之風」(the Wind of Change) 政策，放任殖民地獨立。就在這一百年間，英式帝國主義認同觀，紛紛在殖民地獨立風潮中解構。此外，英國更讓境內的蘇格蘭 (Scotland) 及威爾斯 (Wales) 於 1999 年成立議會，完成「權力下放」(devolution)，走向歐盟 (European Union) 所提的「多元化的統一」(United in Diversity)。
5. 正常化國家時期（1960 至 2006）。本期與上一時期重疊的時間長達卅年。大略而言，自宣布走入「改變之風」之後，英國已動手建構正常化的國家認同模式，不再為帝國主義征戰四方。他們藉大英國協維護英國與殖民地關係，譴責並杯葛南非英裔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 (Apartheid)，疏遠與羅德西亞 (Rhodesia) 白人政府的軍事外交及經濟關係，重建英國在海外形象。同時動手建構正面多元的國家認同感。

這種歷史的分期不是絕對的，只是便於研究及敘述。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時期英國都能利用不同的形象 (icon)，建構其不同的認同感。畢竟，歷史是有機的變動性發展，有些認同感固然能流之久遠，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物換星移之際，歷史上代有才人輩出，因此，英國官方國家認同感也必得接受時代的冶煉，乃有此起彼落之現象，而為每一世代，推衍出時代的特色及表徵。

本研究的方向，在於討論英國官方帝國主義認同感的建構與解構，並期望以這段發展歷史為鑑，權充台灣建構或維護國家認同的他山之石。

## 貳、前西發里亞條約時期

### 一、早期缺乏國家認同感

一般英國史以 1066 年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打入英格蘭南部哈士丁 (Hasting)，並攻佔倫敦，為英國史開端。早期的英國，缺乏國家認同感。主要理由有三：其一，入侵者威廉來自今日的法國土地。很長一段時間，英國的統治者仍未釐清到底「英國是法國的一部份」，或者「法國是英國的一部份」。這一切要等到英法百年戰爭 (1337 至 1453 年) 之間，英國本身才逐漸出現自覺性的國家認同，才發展出獨立意志與獨立運動 (Griffiths, 1988: 198-200)。其二，當時仍是中古時期，教權一直高於王權，而教權的高峰點在義大利的羅馬<sup>4</sup> (Maxwell-Stuart, 1997: 128-40)，因此，英國上下未充分認同自己的國家。其三，當時有許多英國國王率兵參加十字軍東征，他們心在聖城異邦，不在本國。他們無心內政，只關心聖戰。被迫簽下『大憲章』(Magna Carta) 的約翰王 (King John) 便是一例，他甚至援引教權以鞏固王權。

這時，英國上層社會寫的仍是拉丁文，說的仍是法文。英文及英語是中下階級的語言，而且英倫三島尚未完成統一，有些人仍使用北歐語言，部分蘇格蘭及愛爾蘭用的是凱爾特語 (Celtic) (Anderson, 1991: 41)。換句話說，當時英國政治未統一，民族未統合 (integration) 亦未同化，缺乏共同的語言，缺乏成形的文化形象，無所謂集體的國家認同感。

### 二、共同敵意

英法百年戰爭之際，英國人在戰場上注意到英法語言的差異，英法兩

---

<sup>4</sup> 在 1305-1378 的 Avignon Papacy 期間，七位教皇全是法國籍，而且教皇駐蹕 Avignon 而非羅馬。

國之間的敵意，醞釀了兩國之間相異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法國的聖女貞德（Jeanne d'Arc）要將英國人趕出法境的呼聲，固然喚醒法國人保衛鄉土的決心，也喚起了英國人的民族認同感<sup>5</sup>。戰爭之際的彼此敵意，事實上是激發民族意識的利器。因此，百年戰爭結束之後，英國放棄了對法國地區的領土野心，開始走向「去法國化」，開始動手將英國建立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Griffiths, 1988: 196-233）。

戰爭凝聚了英國人對法國的共同敵意，同時促進了英國人的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除了拉丁文及法文外，當時英格蘭地區已逐漸出現盎格魯·撒克遜式（Anglo-Saxon）的早期英語，而在許多中下階級的軍人與平民之間使用，這種夾雜著拉丁文、法語、北歐語、凱爾特語、德語、西班牙語的綜合體，逐漸內化成為後來的英語。英國軍人如喬叟（Geoffrey Chaucer）就是在英法百年戰爭中，萌生對英國的國家認同，他在離開戰場後，開始以古老英文寫作，並成為文學家。有趣的是，他的作品結構及內容仍殘留軍人聊天說故事那種七葷八素的味道，風趣十足。

### 三、海軍與航運

此外，百年戰爭之際為了運兵橫渡英倫海峽，為了籌措軍費，英國一面發展海軍，一面加強海上貿易。於是，亨利七世（Henry VII）時，已在羊毛貿易上佔有一席之地。這類航運貿易的交流往來，也促進了英語的統一進程。

1492年，義大利人哥倫布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發現了美洲大陸。亨利八世（Henry VIII）則支持另一個義大利航海家約翰·卡伯（John Cabot），而於1496-97年之間，在今天的紐芬蘭（Newfoundland），為英國建立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展開英國擴張海外殖民地，建立大英帝國的先聲。同時亨

---

<sup>5</sup> 聖女貞德的名言為：Of the love or hatred God has for the English, I know nothing, but I do know that they will all be thrown out of France, except those who die there. 她這句話充滿敵我對立，一決生死的英法民族情仇。

利八世更繼承父志，建立現代化的英國皇家海軍。日後，皇家海軍成爲英國凝聚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形象，皇族成員、貴族、名商富要及知識階級，均以參加皇家海軍爲榮。皇家海軍亦昇華成促進帝國主義認同感的重要手段性工具。

在皇家海軍的高姿態統馭下，英國對內可統一軍用語言，建立英國海商軍民制度，對外可打擊敵國，拓展殖民地，並將侵略性十足的英國帝國主義認同感，伸展到海內外去。

亨利八世時代在皇家海軍奠定的基礎與實力，終於在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開花結果。女王命令海軍將領法蘭西斯·崔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探索新航線，經略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土地，挑戰西班牙海軍。結果，崔克成爲第一個真正帶領海軍環繞地球一周的艦隊長官<sup>6</sup>。1585年，英國與西班牙開戰，英國直接挑戰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King Philip II）的無敵艦隊（Armada）勢力，而於1588年7月，在英倫海峽一帶打敗無敵艦隊，肇始了日後英國皇家海軍揚威七海，長達三百餘年的光榮歷史。

在皇家海軍的護衛下，英國也在此一時期開始支持大型的地理開發公司，頒發特許狀（Royal Charter）給這類公司，特許他們經略海外。這類公司之中赫赫有名的有「麻塞諸塞海灣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這家公司開發了新英格蘭；二、「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這家公司後來經略南亞、東亞、中國及日本。

此外，皇家海軍也是維護英國海外殖民地的軍事後盾。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於1541年，以海軍染指愛爾蘭（Ireland），1610年起，在愛爾蘭興業殖民，創設大農場（plantation），並將之納入帝國範圍之下。此一作風，以後會在其他海外殖民地複製繁衍，成就帝國大業。

---

<sup>6</sup> 史稱麥哲倫（Magellan）係環繞地球第一人，但他死於菲律賓，他的船隊後來繼續完成他的使命。真正活著帶領船隊完成環球任務的人，實際上是崔克船長。

#### 四、建立獨立的宗教認同感

亨利八世與伊麗莎白一世的都鐸王朝，以及詹姆士父子的斯圖亞特王朝（Stuart Dynasty），都在前西發里亞時期動手塑造英國官方國家認同感。除上述建立皇家海軍，縱橫七海之外，從亨利八世起，更藉口「重婚」未得教皇批准，而自立英國國教（Anglican Church），企圖將來自歐洲大陸的天主教勢力，排除於英國之外，建立以英國坎特伯里（Canterbury）大主教為中心的英國國教派，鞏固英國官方認同的中心思想。

宗教自主化的浪潮，始於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貼出九十五條反對贖罪券抗辯書之際。其後，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浪潮下，歐洲反對天主教浪潮由德國北部傳到各地，英國也加入了這一次宗教改革的奪權行列。1555年9月，西歐國家終於爭得『奧古斯堡宗教和平條約』（*Religious Peace of Augusburg*）之簽訂，初步確立各地的信仰自由，羅馬的教權漸由各國轄區內淡化退出。亨利八世之改信奉英國國教，亦係為確立英國主權，擺脫歐洲之干涉。當時確立的原則是「誰的主權範圍，就由誰決定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透過教權本土化，英國國王得以沒收天主教教產，充實國庫，割斷羅馬教皇之干涉英國宗教及內政，促成國內共同的官方宗教認同感。以約克郡的「湧泉修道院」（Fountains Abbey）為例，1539年亨利八世厲行解散修道院政策之後，修道院遭到淨空，1540年，竊賊光顧，搬走彩繪玻璃及值錢文物，其後，五百餘英畝的修道院被皇家賣給商戶。

國教創建初期，天主教成了英國境內的異端，天主教神職人員及信徒被迫改信新教，或遭到迫害還俗。天主教淪為地下信仰，教堂紛紛化為廢墟，或改歸新教財產。

為了建立官方宗教認同感，都鐸、斯圖亞特兩個王朝，以及克倫威爾（Olive Cromwell）領政的內戰期間，官方均不惜殺人放火，甚至毀壞基督教神像（icon）。即便是克倫威爾故鄉鄰近的伊麗大教堂（Ely Cathedral）

也被關閉十一年。大教堂內的「聖母堂」(Lady Chapel)四壁，本來雕刻著長列的聖經故事石雕神像，這批神像的頭部皆於 1539 年宗教改革敕令之後，被砍除殆盡，只有牆角的一座壁堵上，保留下來兩尊有頭的神像。

整飭異端，公開焚燒女巫及男巫，公開審訊異教徒，公開執行死刑，也是英國宗教改革期間，常見的殘酷活動，目的是在打擊不同認同感的人士。這是英國式的宗教審判 (Inquisition)。《烏托邦》(Utopia) 一書作者湯瑪士·摩爾 (Thomas More)，本為亨利八世身邊的信臣，而且曾任國會下院的議長；然而一旦反對亨利再婚，一旦公開支持教皇，反對英國國教之改革，反對英王在英國國教的最高領導地位，亨利八世立刻割袍斷義，將他送上倫敦塔上的斷頭台。顯然，當官方在建構民族宗教的認同感時，既定政策是不容挑釁的。

亨利八世之後的一部小插曲，是瑪麗·都鐸 (Mary Tudor) 在位的六年內 (1553 至 1558 年)，試圖恢復天主教，並大開殺戒，屠殺國教派教徒。她因此被貶稱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她一謝世，繼位的伊莉莎白一世立刻恢復國教勢力，並且於 1559 年重修《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

亨利八世在位時，曾責成坎特伯里大主教撰修《公禱書》，以統一教義。書成之時，已是愛德華六世 (Edward VI) 時代的 1549 年。當時英國國會規定，今後教會活動均以本書為依歸，舉凡禮拜天及節慶之祈禱、領聖體、施洗、堅証、結婚喜慶、訪病、喪禮及授秩等等，都要遵守《公禱書》的禮儀及經文。

## 五、走向共同語言

《公禱書》於 1662 年再度修訂之後，至今未再修改。這是一本以英文撰述的公共性宗教書籍，本書影響日後英文之崛起與發展，並且成為統一共同宗教認同感的一大重要統御工具。

為了統御宗教思想，英國國教雖沿襲了天主教時代以坎特伯里大主教

座堂為中心的教會管理模式，但將修道院的院規教諭完全改依國教，並出版詹姆士版英譯《聖經》，提倡以英文傳教，透過每天的宗教活動，強化民族形象，統一語文。

雖然，在建軍及宗教改革上，英國積極朝民族國家認同的方向前進，積極提倡英語及英文，但在本期結束之1648年之前，仍未完成語言統一。都鐸王朝的宮廷仍充斥說拉丁文及法文的貴族，亨利八世及其第二任妻子安波琳（Anne Boleyn）仍說法語。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士一家使用的語言是蘇格蘭語、英語、法與及拉丁文。拉丁文仍是當時的重要書寫文字。兩朝御用文人培根·法蘭西斯（Francis Bacon），一生著作等身，但他大多以拉丁文寫作。劍橋與牛津的學術論文，仍以拉丁文見人。當時的英文尚未進入大雅之堂。

## 六、英文文學之發軔

一般英國史皆以喬叟（Geoffrey Chaucer）為英國文學之父，他的《坎特伯里的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卻仍夾雜大量的古法語、拉丁文及英國盎格魯撒克森的古老俗語。喬叟是英法百年戰爭時代的人物，他多次隨軍赴法參戰。或許這個緣故，他認識到英法兩語的不同，而且自覺到應該以自己的語言寫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485年出版的《亞瑟傳奇錄》（*Morte Arthure*），已經以古英文寫出日後英國傳奇或童話的最重要英雄——亞瑟王，而為日後官方國家認同感引路。這本書也是目前所知第一本在英國印刷的文學書籍，印刷商是「卡克斯頓」（Caxton）印刷所。作者則是出身於華威郡（Warwickshire）的湯瑪士·馬洛利爵士（Sir Thomas Malory）。這本書日後被許多英國名家翻寫，台灣國民熟知的英國傳奇《石中劍》，指的便是亞瑟王的傳奇。無疑的，亞瑟王是英國民族認同的重要英雄人物。更重要的是，書中寫出亞瑟王由對羅馬的認同，轉變成對英國本土認同的過程。亞瑟王的故事，後來在十九世紀時，由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的譚尼森（Alfred Tennyson）以細膩的英詩改寫，內容提升了對英國的認同感及趣味化。亞瑟王的傳奇，因此深入人心，廣及全世界。

## 七、早期的大眾傳播

透過印刷術的傳入，英國乃逐漸走入活用「大眾傳播」的初期，其後逐漸出現單張印刷的小傳單，以及官方的政策宣傳品。懲兇罰惡的公開斬首事件、或是焚燒男女巫，皆利用印刷品及版畫宣導出去。當然，亞瑟王的傳奇形象，亦透過教育及書籍印刷，傳入各階層社會。

戲劇也是都鐸王朝時期，另一個建構國家認同的大眾傳播新工具。中古的街頭藝人及遊吟詩人（minstrel），到了這時期，已發展出巡迴劇團，倫敦及坎特伯里都出現平民可以進入觀賞的新劇場，戲劇用語也逐漸由拉丁語轉變成平民使用的英語。伊莉莎白女王及其後的英國國王，也知道透過戲劇拉攏民心。

這時的兩大英語劇作家為馬洛伊（Christopher Marlowe）及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馬洛伊出身於劍橋大學，擁有碩士學位。他的第一部作品《坦伯蘭》（*Tamburlaine*），寫的是征服東方暴君帖木爾（Timur）的故事，劇中充滿反土耳其的仇外色彩。後來，他又寫了第二集。另一部作品是《浮士德悲慘史》（*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內容是浮士德把靈魂賣給魔鬼的故事，劇中亦出現鄙視日耳曼人的意涵。其後，他寫了《馬爾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劇情是馬爾他猶太人的野蠻，以及挑戰當局權威的報復行徑。在《巴黎大屠殺》（*Massacre at Paris*）一劇，則以 1572 年的巴黎屠殺事件為背景，內容充斥批判天主教徒叛國的劇情。他的這些戲劇，非常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而且普受歡迎。值得一提的是，他擅長以英文「無韻詩」寫戲，頗得觀眾喜愛。可惜，他英年早逝（1564 至 1593 年）。

同年出生的莎士比亞（1564 至 1616 年）不只較為長壽，而且成為英國文學界最偉大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頗豐碩，重要作品包括十七齣喜劇，

十一齣悲劇、十齣歷史劇，合計卅八齣。此外，更有一百五十首十四行詩及各類詩作。伊麗莎白女王時代，他的劇團係由宮廷大臣（Lord Chamberlain）在背後撐腰。以蘇格蘭王入主英國的詹姆士一世（James I），曾公開以英王之尊支持他，使他成了「國王的人馬」。他的文學造詣固然崇高，但卻是十足的御用劇作家。歷代的英國政府，不斷地拿他來建構官方的國家認同感。有些文學史家認為，他可能不是唯一作者，他的背後可能還有前述的馬洛伊和培根兩大御用文人（陳冠學，1998）。假如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那麼，英國官方建構認同感的鴻圖，更為昭然若揭了。

莎士比亞的作品中，譏貶外國推崇英國的痕跡，明顯易見，但技巧高超，不著痕跡。謹舉二列如下。《哈姆雷特》（*Hamlet*）劇中那個遲疑不決的丹麥王子，名叫 Hamlet，Ham 在古英文裡，指的是羅馬時代留下來的農莊，let 放在字尾則是「小」的意思。換句話說，Hamlet 暗喻的是「小農莊的小人物」<sup>7</sup>。這號人物在殺父奪母的叔叔面前，顯得卑微認份；即使遇到可以復仇時，也拿不定「是或不是」（to be or not to be）。《朱力阿斯·西撒》（*Julius Caesar*）寫的是羅馬宮廷的爭權及暗殺。這兩齣戲都是張力十足的悲劇，歷來很受歡迎，詳細一看，內容是在批判外國政治的冷血無情。一個轉身，寫到英國的歷史劇時，他就顯得很愛國了。難怪他的歷史劇大多沒沒無聞。當時的人比較喜歡他的喜劇，每次在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劇場（Globe Theater）演出時，常常是爆滿。觀眾通常站著看戲，精采處每每是滿場叫鬧，手舞足蹈。

劇場與宣傳印刷品兩者正是早期的大眾傳播工具，斯圖亞特王朝在發展早期的國家認同時，已經知道善加運用莎士比亞的戲劇，並以印刷宣傳品推波助瀾。

---

<sup>7</sup> 即使在法文區，Hamlet 亦指「小農莊」，凡爾賽宮之內便有路易十六之妻瑪麗·安東尼（Marie Antoinette）所建的 Hamlet，法文另又稱之為 *Petit Hameau*。

## 八、斯圖亞特王朝的認同政策

然而，斯圖亞特王朝的四個國王係來自蘇格蘭，他們都明白駐蹕英格蘭倫敦的孤立感，他們發現兩地文化及社會生活的格格不入，他們也知道有些英格蘭貴族及商賈不贊成蘇格蘭王入主大英帝國。

因此，他們更加努力建構共同的認同感，政府通用的語言，也逐漸轉為英語。為了籠絡貴族及中上階級，宮廷開始在劍橋附近的「新市」(New Market)發展養馬及賽馬，將賽馬轉變成此後皇家與中上階級聯誼的重要活動。此外，亦經常舉辦季節性的「獵狐」(fox-hunting)狩獵活動，製造聯誼機會，並檢驗受邀者的出席率，進而間接查驗忠誠度。直到今天，獵狐仍是英國人重要的活動形象，許多小說及電影，甚至國會辯論，仍然以之為主題。

在經營帝國海外殖民地方面，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繼承了都鐸王朝建立的強大海軍。這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已在 1604 年結束英西廿年海戰的『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之後，潰不成軍；英國艦隊進而拉攏荷蘭及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結合成海上最大勢力，確保了公海的自由航行權及貿易權。因此，英國得以在 1607 年在美洲的處女地(Virginia)建立詹姆士鎮(Jamestown)，開展拓土美洲的先聲。同一年，殖民紐芬蘭(Newfoundland)。1610 年，殖民愛爾蘭，並發展大農場經營策略。此後，大農場經營模式，也成為英國經營海外農業的基本型態。

在那個王權興起，民主議會尚未成型的年代，勝利的戰爭以及海外的開疆闢土，再再為英國皇家政府帶來內聚力及向心力。這對建構早期帝國主義認同，助益甚鉅。

## 九、官辦民營的海外政策

然而，英國的海外事業，並非完全由官營的「大有為政府」所主導。早在都鐸王朝亨利七世(Henry VII)時，英國便援引貴族及商賈以民間股

份的「特許狀公司」(Charter Company)，參加海外開發及貿易。這是官辦民營(BOT)的早期模式。這個模式，使得官民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政府的穩定及成功，關係到民間投資者的商業貿易存亡；這種官商勾結的互利模式，在英國發展成帝國主義一大重要而且正面的原動力，而非完全負面的腐敗或貪污情況。

此一早期發展，在斯圖亞特王朝開花結果。北美的詹姆士鎮，係由「麻塞諸塞海灣公司」所開發，並以英王名諱命名。「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英國政府授權的特許狀公司。這一家公司日後在海外的經營，促成大英帝國在南非及東亞的海外霸權。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的伊麗莎白一世時代，得到皇家特許狀(Royal Charter)，公司總部設於今日的倫敦城<sup>8</sup>，投資者為貿易商、金融人士、中上富商及貴族，係一股份公司。公司之內養有私人軍隊，主要業務為：(1)維護由倫敦至印度的航線暢通；(2)對印度之開發及貿易；(3)對東亞之開發及貿易。日後，這些開發及貿易所在，均轉變成大英帝國的海外侵略與併吞土地，而為帝國留下累世罵名及盛世英名。但是對英國子民及受益者而言，這是帝國的金雞母，這是帝國事業發展的重要形象。

由於當時紅海的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尚未開掘，所以航線要繞道南非；到達印度後，航線又延伸到麻六甲海峽及新加坡。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順利開拓下，1615年，湯瑪士·羅伊爵士(Sir Thomas Roe)奉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命，進謁當時印度最大的統治者：蒙兀爾皇帝賈安吉爾(Mughal Emperor Jahangier)，要求通商並設立貿易據點。當時印度仍是四分五裂，尚無今日統一的國家形式。結果，這次進謁成果豐碩，英國凌駕其他西歐海外勢力，成為主控印度的唯一勢力。1634年，印度皇帝夏·加罕(Shah Jahan)又將孟加拉(Bengal)劃歸英國經貿勢力範圍。孟加拉是當年世界最大的棉紡工業中心。從此之後，開啓了英國在印度的三百年帝國殖民事業，然後又以印度為基地，將勢力伸展到東亞。

<sup>8</sup> 倫敦城在倫敦市內，即今日金融中心所在的「方里之地」(Square Mile)。

## 十、走向民主化的主權國家

然而斯圖亞特王朝在海內外的成就與榮耀，卻不敵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的種族內鬥，更不敵貴族與王室爭奪政權與治權的現實問題。歷經詹姆士一世及查理一世（Charles I）兩位國王之後，英國於 1642 年爆發了由克倫威爾（Olive Cromwell）領導的內戰。1649 年，查理一世在倫敦遭到國會斬首（Grun, 1991: 290-94）。英國走入平民國會與國王共治的新時代。當時雖稱平民（Commons）國會，實際上議員皆係貴族及富賈，此後，王權遭到制衡，政治上走上貴族式的民主。

就在查理一世被砍頭的前一年，歐洲大陸的卅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結束，以奧地利爲首的神聖羅馬帝國，被逼簽下『西發里亞和平條約』，承認轄下各國王權，並開始於條約中劃定國與國之間的疆界。

1648 年的『西發里亞和平條約』，首度肯定歐洲地區主權國家的地位，肯定國不分大小，皆得以享受平等的國際法地位，並保障小國及城邦的獨立主權。這紙條約後來發揮了國際法的約束力，給予小國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小國得以在大國的壓力下自由活動。主權與平等成爲國際外交的基本要求，今日國際平等外交的行爲典範，在此初步確認。

『西發里亞和平條約』第一條強調：爲了和平與友誼，敦親睦鄰之策必須重新開啓，並促其茁壯，再茁壯。第二條強調，爭端兩造必須忘掉敵意，互信互諒，衝突之際，不應傷及平民、不應傷及個人及國家的地位，更不可以損害貨物及產品之安全。戰爭期間，不宜以暴力、惡言惡語及敵意傷害個人<sup>9</sup>。這種條文，充分顯現威尼斯商人及政治家保護商業利益及個人權力的胸懷。

其中第六十四條及第六十五條則意謂：爲了避免政權國家（Politick State）未來的歧見，在簽約之後，所有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選侯國

---

<sup>9</sup> 見 Article I & II, *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

(Electors)、王國、及國家，均得以確立並保障其故有權力、主權、自由、特權、領土自由權、教權、王侯之權，任何人不得以各種藉口，干擾他們的權力及利益<sup>10</sup>。現代主權國家重視獨立政府，確立國境疆界，確保國內人民福祉及權益的定義，在條約中受到肯定。此後，西歐各國自由發展，走向民族國家型態，各自選宗教信仰權；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從此以後，國家認同的發展，如虎添翼，更上一層樓，英國亦進一步走向「帝國主義認同」的大時代。

## 十一、流傳至今的文化形象

截至 1648 年為止，英國境內已出現貴族教育的「公學」(public school)、牛津大學及劍橋大學。亨利八世及克倫威爾之時，又在德蘭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設立神學及教育中心。英國已經有能力透過教育，延續英國的國家認同感，不必外求於歐洲國家。

在這個草創英國國家認同感的時代，具體而重要的歷史性人事物共同形象(iconography)(Taylor, 1989: 135)，除了前述的亞瑟王、皇家海軍、特許狀公司、海外殖民地、詹姆士版英語聖經、亨利八世、伊麗莎白一世、莎士比亞其劇本、賽馬、獵狐等等之外，流傳至今的文化形象(cultural icon)。尚有下列幾項較為著名的項目：

### (一)綠袖子 (Green Sleeves)

這是一首亨利八世時代的英格蘭民謠，相傳是亨利八世為思念安·波琳而作。這首歌出現 1580 年的曲目登錄上。1584 年的 *A Handful Pleasant Delights* 一書曾提到這首曲子。到了克倫威爾的內戰時代，這首曲調在軍中頗為流行。從此以後，這首曲調成為英國古曲的象徵，而且流傳至今，甚至傳到今日台灣。

<sup>10</sup> 見 Article LXIV & LXV, *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

## (二)英國國教大教堂

英國國教係本時期建構國家認同的主力之一，國教教堂則是文化形象的重點。亨利八世雖在 1539 年下令解散修道院，但解散的只限於堅持天主教的修道院，願意改變的教堂大多得以保存下來，並成爲信仰中心。這一類的教堂大多能保持到今天。其中包括：英國國教權力中心的坎特伯里大教堂<sup>11</sup>、倫敦的聖保祿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sup>12</sup>、皇家婚喪喜慶及登基常用的西敏寺（Westminster）、北英格蘭的約克寺（Yorkminster）、德蘭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巴斯大教堂（Bath Cathedral）等。這些教堂大多爲哥德式建築，有些還殘存「北蠻」（Norman）遺風。巴斯大教堂則很有趣，門口雕刻兩排天梯，天梯上有許多天使正往天堂攀爬，其中有一個天使不慎滑落，作掙扎狀。這些教堂正是當時維繫民心的重要功能性工具。這些教堂之下，尚統轄許多地方小教堂，教會受政府指導，達到宗教服務政治的功能。

## (三)皇宮城堡

皇宮城堡是英國國王政治權力的中心及象徵。這一時期，英國國王尚未居住白金漢宮。這兩朝的國王，喜歡在泰晤士河沿岸的皇宮之間，隨意遊居。這些遊居皇宮包括：西敏寺皇宮（Palace of Westminster）<sup>13</sup>、白宮（Whitehall）<sup>14</sup>、倫敦塔（Tower of London）<sup>15</sup>、格林威治宮（Greenwich Palace）<sup>16</sup>、杭普屯宮（Hampton Court Palace）以及如今仍在使用的溫莎堡（Windsor

---

<sup>11</sup> 坎特伯里大主教座堂位於英國南部的坎特伯里古城邊，這是英國教的權力中心，每年都有朝聖人潮。喬叟的《坎特伯里的故事》，就是以英國人由倫敦步行到此朝聖爲寫作背景。

<sup>12</sup> 在 1666 年尚未被大火燒毀之前，the Old St Paul's Cathedral 是英國最大教堂。新教堂是 Sir Christopher Wren 於大火後於同一地點設計與重建的。

<sup>13</sup> 西敏寺宮已不再是皇居，目前是國會的一部份。

<sup>14</sup> 白宮已非今日皇居，目前是外交部所在。

<sup>15</sup> 倫敦塔已非皇居，目前已開放民間參觀。

<sup>16</sup> 格林威治宮已不使用，該地已改爲 Queen's House、天文台及皇家海軍大學等。

Castle)。這些皇宮內部大多富麗奢華，外部則高牆圍立，頗具威嚴與震撼力量，足以及在人民之間建立權威感。

#### (四)不列顛女神 (Britannia)

羅馬帝國佔領今日英格蘭領土之時，稱呼這個地方為「不列顛」。羅馬皇帝哈德良 (Hadrian) 鑄幣時，創造了不列顛女神，並將其頭盔像及身著戰袍的身影，雕刻在錢幣上。從此，不列顛女神成為英國的具體象徵<sup>17</sup>。這個認同的具體形象，在都鐸王朝及斯圖亞特王朝時，被炒作放大，放到海軍軍艦上，以代表英國。這個創造發明的傳統形象，流傳至今，仍是今日英國國家認同的重要符號。

#### (五)米字旗

1603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斯圖亞特王朝擷取英格蘭白地紅十字的「聖·喬治 (St. George) 旗」、蘇格蘭藍地白「X」字的「聖·安德魯 (St. Andrew) 旗」，以及愛爾蘭白地紅「X」字的「聖·派翠克 (St. Patrick) 旗」，組成米字旗。

這面英國國旗，照顧了英倫島上的三大政治勢力。這面旗幟，英文稱之為 Union Flag 或 Union Jack，這是英國在國內外的代表形象。這是斯圖亞特王朝刻意創造並設計的統合性工具，目的在於建立三方子民的國家認同感。

### 參、結論

都鐸王朝與斯圖亞特王朝，係英國建構國家認同感的第一階段。在此之前，英國人認同羅馬天主教領導的程度，認同法國文化的心態，以及認同歐洲大陸的傾向，遠遠高過於認同英國。當時的英國有點類似今日孤懸

---

<sup>17</sup> 或國家形象 (national icon)。

大陸邊陲的台灣，長期將大陸看成「內地」，看成「文化中心」，即使自己走向邊緣化也不自知，反而要自投羅網，反而要學飛蛾一般，飛向火焰的中心去。

英法百年戰爭之際，英國人開始領悟到英國與法國之不同所在，歸國的軍人開始以英文著書，開始走向「去法國化」及「去拉丁化」的漫長路程。英國人開始走向自己所選擇的國家認同觀念，不再盲從。

亨利八世建立現代化海軍，走入藍海，走入七洋，為英國的海外貿易打開新疆界。英國國教勢力之建立，收回了宗教自主權，揮卻了歐洲大陸的宗教思想羈絆。其後，英國本土文學之興起，讓英國人逐漸將拉丁文及法文看成外國文字。大眾劇場及印刷品的出現，加速了英國國家認同感的確立。海外殖民地的開發與爭奪，加深了英國人團結對外的決心。然後，臨門一腳，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平條約』，裂解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統一形象，西歐各國紛紛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遙居海外的英國於是奔向寬闊的海洋，追求英國的自我利益及認同感。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並非完全與歐洲大陸割斷臍帶，而是吸收歐陸及海內外的精華，逐步建立自我的特色及國格。英國也因此逐漸由歐洲的邊陲國家，自我提升為歐洲政經、貿易、軍事、文化、科學發展的新中心。

## 參考書目

- 陳冠學。1998。《莎士比亞識字不多？》。台北：三民書局。
- Bernard, Grun. 1991. *The Time Tables of the History*. London: Touchstone.
- Benedict, Anderson.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Griggiths, Ralph. 1988. "The Later Middle Ages (1290-1485)," in Morgan Kenneth 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xwell-Stuart, P.G. 1997. *Chronicle of the Popes: 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Papacy over 2000 Years*. London: Thames & Hudson.
- Moore-Gilbert, Bart. 1997.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Said, Edward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Taylor, Peter. 1989.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New York: Longman.

#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of Englan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arly Imperial Identity

Yang Pei-Chang

*Direct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tu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Britain was one of the early European runners pursu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official/imper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its tracks of state build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 political instruments it applied for constructing its identity at the Tudor dynasty and the Stuart dynasty were: (1), military powers, (2), common religion, and (3), common language. Most key figures/senses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we know today were esta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research paper is trying to stitch up the historical road map of how the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was constructed and how much Taiwan can learn fro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Keywords:**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mperial icon, *Treaty of Westphalia*, British Empir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ommon hostility, common language